

难忘一中岁月

郑锐

虽然毕业分配都是每年的夏天，但是我的一中岁月却开始于 1990 年春天。当时安排给我们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八八中文 2 班的实习学校有一中、七中、二十六中等学校，当辅导员老师征求我想去的实习学校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青岛一中，结果我不但如愿以偿被分到一中实习，而且还被确定为一中实习组的组长。

更为幸运的是，当时的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邢德华老师被确定为我的实习指导教师。在此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跟随邢老师备课、听课，有时也帮邢老师批改作业，还照葫芦画瓢地写教案。邢老师则手把手地帮我修改教案，一遍一遍地听我试讲、提出改进意见，最后当我走上讲台正式讲课的时候，我从台下同学们的目光中收获了信任，从一中实习指导老师和师专带队教师的眼中收获了肯定。在一中实习组的 10 名同学中，我最终被评为了唯一的优秀等次。

当时的师范院校是统招统分，而且还是二次分配，即按照学生原户籍地统一分到当地教育局，再由教育局进行分配。那年暑假的一天，我们终于拿到了犹如盲盒一般的派遣通知单，我被分到的学校是青岛一中。时隔多年，那种心情，真是既惊讶，又兴奋。来学校之后，负责人事工作的曹守梅主任告诉我：“小郑是优秀毕业生，是学校特地要来的！”

就这样，时隔几个月之后，我从青岛一中的实习教师，正式成为青岛一中的一名年轻教师。

和青岛的绝大多数中学一样，一中当时是一所完全中学。学校实行的是年级组与教研组双重管理的教育教学模式，初来乍到的我被学校安排担任初一 3 班和 5 班的语文教师。语文集备组是同样属虎的林晓英老师和陈芙兰老师这两位邢德华老师的同龄人再加上我这个 21 岁生日还没过的教育新兵。和邢老师一样，林老师和陈老师也都对我关爱有加。记得开学第一天，早晨 8 点不到，我刚在办公室里坐定，教导处的老师就来通知我：“第三节课，学校领导要来听你的课，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吧。”

闻听此言，我只觉得自己的头瞬间就大了！这可咋办呢？

就在我六神无主之时，林晓英老师主动对我说：“别慌！第一节课去听一节我的课。”

坐在林老师的班里，我发誓，那是我听过的最认真的一节课！

林老师讲课的所有过程被我一一记录在案。第二节课和课间操时间，我对照林老师的教学流程，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备课教案重写了一遍，这份教案至少是我原先教案字数的两倍！所以第三节课，当工会肖红芬主席和教导处李桂美主任听完我的课之后，只对我提了一条改进意见，就是希望我讲课的声音能再大一点。

开学不久，初一年级组的组长徐梅老师通知我同时担任初一 3 班的副班主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是张永青老师。1991 年上半年，张老师因为身体原因请假两个月，我也就赶鸭子上架当了两个月的代理班主任。

1991 年在暑假结束前的全体教师大会上，我才知道自己被安排为新初一 5 班的班主任，虽然有些突然，但是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新初一的年级组长是王宝珂老师，也是一位和邢德华、林晓英、陈芙兰老师的同龄人。6 位班主任是“四

老”加“两新”，王老师所教的2班和5班，与我一样，2班的孙嘉妮也是一位新晋班主任。

每天早晨的早自习，王老师都会在各班巡视一番，重点当然是她所任教的2班和5班，她几乎每天早自习都会走进我们班的教室，顺手把两三道题写在黑板上，而日复一日的这种“小灶”，也使我们班的数学几乎每次考试的平均分和优秀率都能在全年级获得数一数二的成绩。

因为我是学中文出身，而且业余时间喜欢舞文弄墨，大学时就是校报的学生记者，而且还创造过一项据说空前绝后的记录，就是从我入学到毕业的两年师专学习生涯中，我的文章出现在了每一期那张双旬出版的《青岛师专报》上，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常在《青岛日报》和《公共关系导报》发表文章，并且很快成为《青岛日报》的通讯员和《公共关系导报》的特约记者，所以来到一中不久，学校团委书记吕文光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高鹰老师就让我担任了《中国初中生报》青岛一中记者站的辅导教师。不久之后，我所辅导的多篇学生作文就登上了《中国初中生报》的版面，其中李晓萌的一篇文章还获得了全国一等奖，我所撰写的《有益开卷当几何——当代中学生阅读调查》与《静止抑或奔腾的旋律——中学校园文艺活动速写》两篇整版的大特写还相继获得《中国初中生报》的季度好稿。

我的一篇《初为人师》的散文还几乎同时刊登在《青岛日报》和《人民教育》上，并且被收入《老师的作文》，这是一篇千字文，在这里不妨照录如下：

从师范院校的中文系毕业，天经地义地得进中学任教。于是在一个秋日的早晨，我站在了讲台上，我的学生的对面，接受他们对一个青年教师的真诚问候。

终于告别了十几年高桌子、矮板凳的学生生活，开始领着两个班百十号初一“小豆子”走向鲁迅、老舍、朱自清的世界。对于角色的转变，虽不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梅杰那样感到无所适从，可也禁不住要想：假如实习时间再长点……

可不是，一周六个教案、十二节课，外带批作业、改作文、查阅教学资料、个别辅导、看早自习、检查课间操、组织主题班会、与学生家长谈话，一天到晚，整个成了一尊上足发条的马蹄表。老教师见了，不免打趣道：“怎么样，够你适应一阵儿的吧？”

“学到用时方恨少”，不错的。好在不管是教学上小小的疑问，还是班级管理棘手的难题，老教师都悉心给予指点，咱自己更肯虚心学习——反正这辈子当老师是头一遭，当学生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乔伊斯、卡夫卡、波德莱尔们只好暂时被束之高阁了，只有一次播映权的《豪门恩怨》也连续不上了。有一天忽然觉得该问一句：现在又是哪个歌星开始走红了？

觉得累吗？

确实有一点。可每当轮到课堂上自己精心设计的问题引出一排排高举的臂林时，办公室里的促膝谈心，终于让调皮鬼们发生转变时，特别是骑车走在街上听到学生们齐声叫出“老师好”时，那份惬意，真想找个人分享。难怪老同学相见，一个个总免不了充满自豪地抢着说“我学生”，“我学生”的。

初秋天气，早晨走得匆忙，套头衫给穿反了。待我发现时，早自习已经过去大半。一边想着明天该再早点起床，一边在心里敲起了小鼓：可别让学生瞧见，为人师表，衣着整齐是少不掉的。

可是已经被个别学生看到了，而且还写进了观察日记，甚至拿这件事跟鲁迅

的老师藤野先生的穿戴马虎作比较，最后竟然落笔在同样对教学的一丝不苟上。一阵脸红，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漾上心头。将来有一天，也许会真的无愧于诸如此类的文字？

有一阵班里时兴起外号，居然上着课就叫了出来。这还了得，写检查、叫家长……一个个办法从脑子里闪过，又一个个驳倒。当我把那个“肇事者”叫起来的时候，我只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他先是一愣，低着的头抬了起来，接着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是人。”

“大点声！”

“我是人！”

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感受，除了教学生认字读音之外，更得教他们怎样把那个一撇一捺的“人”字写得端端正正，念得响响当当。

教师节前后，看到老教师们收到的那厚厚一摞寄自天南地北的问候信、教师节卡的时候，我禁不住悄悄地、甜蜜地对自己说：会有的，我也会有的……

记得最早知道我的这篇文章在《人民教育》上发表，还是与张君一主任一起在学校办公楼外的报廊看报的时候，老先生不经意的一句浅浅的表扬：“小郑不错嘛，文章能发表在《人民教育》上！”

在此之前，我除了与老先生在图书馆和阅览室里打过几次照面，印象中几乎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可是老先生居然关注到了我，而且关注到我写的文章！要知道，张主任一生奉献给教育，奉献给一中，是一中人人尊敬的大先生！

在一中的那些年里，做一个年轻教师，真是何其幸也！

作为年轻班主任，王宝珂老师几乎就是我们班的半个班主任。从1991年到1994年，我只担任过一届班主任。1994年中考的时候，我所担任班主任的初三5班在当时的6门中考成绩中，语文、数学、化学三门课程平均分年级第一，政治成绩名列第二，总成绩和优秀率也都名列前茅。

照这样发展下去，也许今天我也会成为一名还算不错的教师。

虽然有文章的白纸黑字，可是必须承认，我食言了。

在一中的几年时间，我有几次离开学校的机会。第一次是1992年，因为我担任《中国初中生报》一中记者站的成绩比较出色，所以被聘为青岛记者总站的辅导教师，当时青岛十九中的团委书记王刚，也是《中国初中生报》青岛记者总站负责人曾多次动员我去十九中工作，但是我觉得还是愿意待在一中。

第二次是1993年，邢老师通知那一年的全市青年教师评优课由我代表学校来上。记得当时我选了一篇描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补充教材，邢老师和集体备课组的林老师、陈老师都觉得，补充教材没人讲过，虽然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但也沒有任何框框，是个不错的选择。最终我凭这堂课，一举获得了全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优胜奖。邢老师在通知我获奖的同时，还对我说：“小郑，你中学是九中的吧？九中的马老师是中心组成员，他知道你中学时候就获得过山东省作文竞赛一等奖，他听了你的课想和你聊聊。”

不久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去到了自己中学6年的母校青岛九中，马老师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母校需要你！”而且表示，只要我同意，调动的问题可以让学校之间谈，甚至马上就准备领我去见校长。不过，这一次，还是被我婉言谢绝了。

现在想来，那时候崂山一中还没改为青岛五十八中，九中绝对是除二中之外的青岛第二，又是我的母校，青岛十九中是一个上升势头很猛的学校，有时候高考成就甚至超过一中和十七中两所省重点学校，他们的校办工厂还在全市的中学

中赫赫有名，据说老师的课时补贴和班主任津贴都比别的学校高出不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两次婉拒这种看似更好的发展机会？我至今也无从解释。

也许是贪恋学校那丰富的藏书？也许是喜欢教师、高中和初中三个阅览室看不完的杂志？也许是能够在午休时和王颖海、杨宝罡、封光、逢伟、孙嘉妮等青年教师经常一起的够级、保皇？也许是课外活动时间和褚玉霞、邢桂范、孙雪梅这些老师在乒乓球室度过的快乐时光？也许是暑假办旅馆值班时一晚上看完一本《老人与海》的珍贵记忆？谁知道呢！

第三次机会我终于非常动心了，那是 1994 年我在参与写作我的大学老师尚永善老师主编的报告文学集《走向辉煌》时，我结识了他的大学同学，时任青岛市教科所的钱惠琪所长，印象中钱所长是一位南方人，很慈祥，在听了尚老师的介绍，并且得知我几乎每年都在《青岛日报》发稿超过 20 篇之后，几乎立即敲定准备调我去教科所编辑他们的一份内部刊物。

可就在差不多同时，我接到了青岛电视二台录取我的通知。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初，那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当很多同龄人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工程师的时候，我的理想却是当一名记者，这也许是受我祖父张喟兹先生的影响，他曾是一位老报人，《卧火藏龙》作者王度庐的连载小说大多由他编辑发表，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是因为我在一中工作的缘故，让我找到了多位他老人家的旧友。

一位是闵光宇先生，他比我外祖父小几岁，因为写稿使他们相识、相知、相熟，我外祖父曾经介绍闵先生到黄台路小学任教，我外祖父做地下工作去杨家山里解放区之前，只向他透露过这一消息。解放后闵先生曾在二十四中担任语文教师，他的儿子闵祥超一中毕业后考入山东大学数学系，后来曾任一中教导处副主任，不过我到一中之时，他已先后担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市副市长了，因为闵市长是一中的老人，学校很多同事都知道他的父亲闵老先生一直住在 2 路电车总站旁寿张路的一座里院中，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闵老先生。从寿张路到掖县路再到江西路，从此之后直到闵老先生去世的长达十几年间，每到过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在最初的那些年，每当我们见面时，他都会拿出他搜集到我新近发表文章的简报，并且称赞我的文章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一位是我外祖父做地下工作时发展的下线郎益盛老先生。我小时候曾经见过他，也知道他住在西镇，但是好多年已经没有联系了。有一天初一 1 班一个女同学来办公室向刘瑞光老师请教问题，刘老师教过她的父亲，所以对她比较关照，她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刘老师说：“郎娜你很聪明，老师希望你像你爸爸上学时那样刻苦认真！”姓郎的人很少，所以我一听这个学生叫郎娜，所以立即追出去问她：“同学，你认不认识郎益盛？”她说：“那是我爷爷！”我说：“我姥爷和你爷爷是多年的朋友，我想去看看他。”于是当天中午，郎娜就领我去见了朗老先生。从他老人家那里，我知道了很多我外祖父的事情。

还有一位是鲁海先生，作为文史专家、青岛市图书馆馆长，他为青岛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1993 年底，我给《青岛日报》采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大特写《棚户区的诉说》。稿子写完了，当时的特刊部主任张志强希望采访我采访一位文史专家，让稿子更加厚实一些，我首先想到了鲁海先生。因为鲁老的长子鲁勇老师当时是一中的图书馆馆长，所以我很容易就去兰山路鲁老的家中完成了采访。采访结束后，我问鲁老是否认识我的外祖父张喟兹先生？他说：“岂止是认识，我比我外祖父小十几岁，我俩是忘年交。我的处女作就是你外祖父给我发表的，1949 年 6 月 2 日青岛解放的时候，我们两人在一起，我是你外祖父编辑的《青岛解放

号外》的第一位读者！”

因此在青岛市教科所内刊编辑和青岛电视二台记者之间，我还是选择了后者。但当时的情况是从教育口调往外单位非常困难，真心感谢一中上下没有给我这个教育的“逃兵”设置太多障碍，最终使我如愿以偿投入了电视台的怀抱！

虽然离开了一中，但我感念一中对我的培养，我也一直心系一中，关心着一中的发展变化，还曾多次应邀回一中采访报道。10年之前，一中建校9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为学校制作了长达20分钟的专题片《为生存与发展奠基》，记得其中有这样几段解说词：

从私立胶澳中学到公立胶澳中学，从青岛市立中学再到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虽然几易其名，但是学校“名流创办、名家管理、名师执教、名人辈出”的办学方向从未改变。作为青岛历史最长的公立中学，学校在办学规模、师资力量、教学水平等各方面长期处于全市领先水平。

走进青岛一中校史馆，人们可以知晓，顾随、王统照、王玫、陈翔鹤、赫保真、于希宁，这些在文学界、艺术界颇有成就的大家，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经历——青島市中或青島一中教师。

余修、于黑丁、周浩然、黄宗江、李鼎文、于宗先、逢先知、罗干、曲钦岳、陈昌本、王学贤、鲁海、袁行霈、田兆钟、潘霞、闵祥超、常德传、张瑞敏、刘永康、郭川、邢广梅、黄晓明，这些各自领域内的佼佼者，他们都曾有过一个相同的身份——青島市中或青島一中学生。

短短几年的一中岁月，是我人生履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是我走上社会的起点。我离开一中已有30个年头，迄今我已在青岛电视台工作30年，我在电视台干过新闻记者、编辑，做过《赢在青岛》、《今日财经》、《今晚》、《青岛故事》等多个栏目的制片人，主编了《青岛文脉》、《感动在身边》等多部新闻作品集，担任过《青岛之子》、《汉字之光》、《青岛先生》、《红色足迹》、《青岛城记》等多部纪录片的总编导、执行总编导，担任总编导组成员的《血铸河山》、《40城40年》等多部纪录片荣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我还是青岛电视台首次航拍《飞越青岛》大型画册的撰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腔多部传统剧目的电视编导。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也仍旧笔耕不辍，迄今已经出版了《净土热土》、《细节青岛》、《蔚蓝文化——青岛》、《青岛的海》等多部文学作品，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山海作证》成为山东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另外我还发表了多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我的那篇名为《王尽美先生》的报告文学获得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奖励，我在开篇这样写道：

德国占领青岛的时候，那些日尔曼人在它这个东方殖民地先后修筑了三大兵营，它们分别是伊尔底斯兵营、俾斯麦兵营和毛奇兵营。其中伊尔底斯兵营如今仍是一座兵营，而且它从建成到现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差不多都是作为一处兵营存在着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一度作了胶澳中学的校舍。现在看来，这座位于太平山南麓占地240亩的院落作为一所中学来说的确是大了些。

我最早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我还是一名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青岛一中的年轻教师，有一天我突然对我任教的这所学校的历史产生了些许的兴趣，于是我并没费多少气力就知道了胶澳中学其实就是

后来青岛市立中学和现在青岛一中的前身，当然一中那时早已搬离了太平山麓而偏居市区一隅。

青岛一中之所以知名，一种说法就是它在历史上有着很好的师资，王统照、陈翔鹤、汪静之等文坛巨子都曾在胶澳中学以及市立中学任教。后来我又得知甚至连王尽美先生也曾在胶澳中学的一间教室中进行过一次讲演，于是便禁不住四处翻阅了关于他的一些资料。

每当我的电视或者文学作品获得较高评价之时，无论台内、台外，熟悉我的人经常还会再来上一句：“人家当年是青岛一中的老师！”我把这句话，当做一句至高无上的嘉许。

迄今为止，我和我唯一担任班主任的那班学生还保持着长久的情谊，尤其是傅东升、冯广和、于鹏、咎慧等一众同学，有的虽然距离遥远，但却经常互动，我开玩笑说：“你们的学习生涯有很多老师，但是我的教学生涯你们却是我的唯一！”我与王宝珂、鲁勇、耿丽华、邢桂范、姜婷、郭文雯等一中人的情谊同样跨越时空，绵延至今！

几个月前，康国老师召集我和封光、逢伟、孙嘉妮、王颖海等几位老同事见面，除逢伟和孙嘉妮这对一中伉俪之外，我和封光、王颖海也都携夫人出席，可是一场聚会下来，我们桌上几乎说的全都是一中往事，往事并不如烟！

一中短短几年的岁月，令我终生难忘，让我魂牵梦绕。直到前几天，我还梦回一中，梦回那久违的课堂……

转眼之间，一中即将迎来百年华诞！我为自己曾经是一中教师而骄傲，我为一中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郑锐，生于1969年10月，1990年至1995年在青岛一中工作，青岛市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青岛市作协常务理事、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